

从《海娃的故事》到“乌贾马运动”

——中国斯瓦西里文书刊的海外传播

何明星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中心,北京 100089)

摘要:1964—1979年15年间,中国面向东非出版发行了斯瓦西里文期刊《中国画报》和包含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国情介绍、文学艺术图书、儿童读物等斯瓦西里文图书约230种。《中国画报》在东非的累计发行数量接近了100万份,图书在东非累计发行了3 981 004册,其中儿童读物的总发行册数是676 482册。这些中国出版的斯瓦西里文书刊在东非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影响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推行的“乌贾马运动”。《海娃的故事》、《小马过河》等中国连环画在当地少年儿童中家喻户晓,有的甚至成为课堂识字的启蒙教材。它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应充分重视中国儿童读物的海外传播。

关键词:东非; 斯瓦西里文; 传播效果; 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2)03-0020-07

今天的中国儿童对于《海娃的故事》知之甚少,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东部,《海娃的故事》等中国出版的斯瓦西里文儿童读物,却是当时东非少年儿童手不释卷的心爱之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话还需要从中国的斯瓦西里文书刊的出版发行说起。中国最早开设斯瓦西里语专业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始于1960年;最早的斯瓦西里语广播节目,是在中国学习斯语第一人陈家宇先生与桑给巴尔斯语专家通力合作下,于1961年9月1日零时向东非开播的;最早出版斯瓦西里文书刊的是外文局的外文出版社;最早的一份斯瓦西里文杂志是《人民画报》(1964年出版)。从1964年开始到1979年,其间历经中苏国际共运大论战以及中国的十年文革,但在这15年中,中国的斯瓦西里文

书刊出版却保持了高速发展,直到1979年才开始减少,到1980年当年度仅出版4种,此后再无新书出版。本文截取1964至1979年这15年间关于斯瓦西里文出版物的品种、内容、发行历史,考察其间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重点是对所取得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从而为21世纪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提供借鉴。

一、中国出版、发行了哪些斯瓦西里文书刊

(一) 图书。外文出版社于1964年组建斯文部,承担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此后一些外籍斯文专家和中国斯瓦西里文学者抽调出来参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据现有统计资料,从1964至1979年的15年间,外文出版社出版斯瓦西里文图书总品种数是230种。内容上可分为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书籍、国情介绍读本、文学艺术图书、儿童读物五类,文学艺术图书包括回忆录、散文、

收稿日期:2012-03-14

作者简介:何明星(1964-),男,辽宁凌源人,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2011XJ026)。

画册、明信片等；儿童读物包含连环画、儿童画册等。

其中毛泽东著作 94 种，是新中国斯瓦西里文出版物的最大宗。最早出版的是《毛泽东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谈话》（1964），具有代表性的图书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6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65）、《毛主席语录》（1967）等等，毛泽东著作占总品种数的 40%。儿童读物有 60 种，位列新中国斯瓦西里文出版物的第二位。最早出版的是连环画《狐狸》（严个凡绘，1964）、《骄傲的将军》（特伟绘）、《我要读书》（高玉宝原著，王绪阳等绘，1964）等，占总品种数的 26%。政治理论读物有 41 种，位列新中国斯瓦西里文出版物总品种数的第三位。最早出版的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4）、《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等，代表性图书有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20 周年》（196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967）等，政治理论读物占总品种数的 18%。文学艺术类图书有 20 种，最早出版的是散文《董存瑞的故事》（左林著，1965），代表性图书有系列摄影画册《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1966）、回忆录《跟着毛主席长征》（陈昌奉著，1973）等，占总品种数的 9%。国情介绍类图书有 15 种，最早出版的是《中国地理概况》（任育地著，1965），代表性图书是《西藏巨变》（1973）、《红旗渠》（1975）等，占新中国斯瓦西里文出版物总品种数的 7%。

在发行方面，斯瓦西里文出版物的海外发行，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得到了快速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受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中国各种外文出版物从 1963 年开始受到 28 个国家的限制，为了突破这种封锁和限制，1963 年 3 月，时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的罗俊率代表团访问欧洲以及西亚、非洲等国家，这些国家包括英国、瑞士、巴基斯坦、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埃及、摩洛哥、叙利亚、桑给巴尔（坦桑尼亚的一部分）、坦桑尼亚、索马里、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等国家，在国外选择外文出版发行据点，落实刘少奇的“打出去”指示。1963 年 4 月，国际书店即派王庸声等赴加纳建立国际书店办事处，此后分别在阿尔及利亚、贝宁等地建立了国际书店办事处。

其中，东非是发行重点。在东非地区除发行英文书刊外，主要就是斯瓦西里文书刊的发行。国际书店在东非的发行网络，主要是通过国际书店支持的同业来开始的。这种支持具体表现在这些书店的门市、店面的房租费、运输车购置等前期开办费由中国先期垫付。有些出版物的文稿在中国翻译好之后，以这些书店的名义在东非出版、印刷、发行，所花费用均由国际书店支付。自 1962 年开始，最早发行中国斯瓦西里文出版物的有桑给巴尔革命书店、坦葛尼喀书店，后来逐步增多。其中桑给巴尔革命书店、坦桑尼亚友谊书店属于中国最早支持的海外同业。而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乌干达的米梯亚纳书业中心、坦桑尼亚友谊书店、坦桑尼亚卡塞书店等到 1980 年代后期还一直与中国保持业务联系，属于国际书店在东非发行网络的骨干同业。

1964 至 1979 年中国斯瓦西里文图书的海外传播，按照品种划分，发行数量最大的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读物、国情介绍等图书，三者 15 年累计发行达到 3 304 522 册，儿童读物的总发行册数是 676 482 册。

（二）期刊。除斯瓦西里文图书之外，还有斯瓦西里文期刊发行。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是《中国画报》。斯瓦西里文版《中国画报》的筹备始于 1963 年底，斯瓦西里文专家有曼苏尔、萨利姆等参与，不久就有中国第一批斯语学者鲁宗惠、文庆梓、胡公锡、金荣景、陈元猛等相继加入。《中国画报》1964 年正式出版，由外文局所属的中国画报社编辑出版，一直到 1998 年 12 月停刊，35 年间共出版了 420 期。编辑部人员除编辑画报外，1980 年代还翻译出版过斯瓦西里文的《中国一瞥》等精美小册子。^[1]

关于斯瓦西里文版《中国画报》的发行数量，目前笔者尚未找到该刊的准确发行量数字，但依据国图公司负责期刊发行的老职工宋广浦先生在 1988 年提供的发行数据，结合长期从事东非发行工作，且目前仍然健在的一些老国图职工的回忆可做一些估算，大体情况基本清楚。

作为唯一发行中国外文书刊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 1988 年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作了一次全方面的总结，其中 1951 年就进入国际书店工作的老职工宋广浦先生专门撰写了《外文期刊发行概述》一文，对 1949 年至 1987 年近四十年的外文期刊发行情况作了介绍。其中值得重视的是西

亚、非洲的发行数据,1965 年 12 月份是 22 854 份,1973 年的数据是 74 429 份。这个期间中国在西亚、非洲发行量最稳定、数量最大的期刊主要是《中国画报》、《中国建设》、《北京周报》三份刊物,假如由此数据平均估算,《中国画报》在西亚、非洲的数量分别是:1965 年 12 月份的发行量是 7 618 份,1973 年 12 月的发行量是 24 809 份。但这个数据是包含了《中国画报》英文版、阿拉伯文版、斯瓦西里文版等三种文版数据,如果再进一步平均估算,可得出《中国画报》斯瓦西里文版的发行量大体上是:1965 年 12 月发行量为 $(7\ 618/3) \times 2\ 539$ 份,1973 年 12 月份的发行量为 $(24\ 809/3) \times 8\ 269$ 份。由此可得出斯瓦西里文版《中国画报》在 1964 至 1979 年的 15 年间平均发行份数在 5 404 份左右,15 年累计总发行量在 90—100 万份之间。这份数据的可靠性,通过负责斯瓦西里文期刊发行的国际书店老职工李书文先生的回忆得到了验证。

李书文先生生于 1941 年,参加了当时主管对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提议的香山外语训练班,在 1965 年 3 月到 1966 年 12 月,跟随桑给巴尔专家苏莱娅等学习斯瓦西里语,此后参加坦桑尼亚援建,在坦喀尼葛农场、桑给巴尔农场担任翻译长达七年之久,1972 加入国际书店,一直负责西亚非洲出版物的发行工作,直到退休。据李先生回忆:当时斯瓦西里文《中国画报》的读者面很广,每期发行量最少几千份,最高时超过万份。尤其是 1966 至 1976 年的十年间,是《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中国画报》三刊发行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而且一般是只要读者来信索要其中的任何一种,就同时赠阅其他二刊,即三刊同时入订,一订三年。这样就使发行量在非洲、拉美地区急剧增长。笔者再结合中国第一批斯瓦西里文学习者,并曾经一度从事斯语版《中国画报》编译工作的陈元猛教授提供的数据,可知斯瓦西里文《中国画报》自 1964 年创刊后直到 1998 年 12 月停刊,35 年间共出版了 420 期,70 年代发行量最高,达到每期 3 万份,90 年代最低,每期 300 份都卖不完。^[1] 以此可知《中国画报》斯瓦西里文版在东非的发行量最高时期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根据《中国画报》原总编辑黄楚安先生的回忆,斯瓦西里文《中国画报》最初定价 1 个坦桑尼亚先令,等于无偿赠送。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画报》的定价标准长期维持在 0.15 元至 0.5 元人民币之间,以 50%、60% 的折扣批发给东

非的书店,这些书店再以坦桑尼亚先令销售。东非当地的销售价格很长时间曾经是五个坦桑尼亚先令,此后分别提高到 10 个、20 个坦桑尼亚先令,80 年代最高达到 50 先令。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1 元人民币大约合 10 个坦桑尼亚先令,而《中国画报》50%、60% 的批发折扣在币值上一下子亏损 50%,可见斯瓦西里文《中国画报》的出版、发行基本上没有利润,大部分外文期刊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发得越多,亏损越大。

上述斯瓦西里文图书、期刊出版物,从中国空运到东非各个国家,运费支出均由中国承担,不需订购者花一分钱。1960 年对外文委曾上报国务院,在陈述把《中国画报》由双月刊恢复到月刊的理由时,提到《中国画报》每期航空邮费是 50 万元^{[2] (P110)},1960 年《中国画报》期发量是 80 万份,相当于每期额外再增加邮费 0.625 元。国际书店老职工武庭杰曾经撰文,以《北京周报》为例说明运费的投入之大。《北京周报》在 1986 年没有调价之前的价格为 0.4 元人民币,而航邮一份杂志则需要额外支付 1.3—1.7 元人民币。以斯里兰卡为例,1985 年斯里兰卡销售一份《北京周报》的售价仅为 1.3 卢比,按照当时的比价折合人民币仅为 0.15 元,即使 1986 年调整定价后,也仅仅增加了 0.08 元人民币,从币值比来换算,如果完全卖出一份《北京周报》,仅仅收回定价的 33%。^[3] 武庭杰先生提供的《北京周报》航邮到斯里兰卡的费用也可以用来计算《中国画报》斯瓦西里文版投递到东非的邮递费用,因为从北京到东非的距离比北京到斯里兰卡的距离还远。即在编辑出版斯瓦西里文版《中国画报》之外,额外投入邮递费用的金额为 117—170 万元人民币之间。

可见,《中国画报》斯瓦西里文版的编辑、出版、发行在 1964 至 1979 年的前 15 年是发展的高峰时期,而 20 世纪的 80 年代之后一直到 1998 年停刊的后 20 年时间,是发展的低潮阶段。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画报》斯瓦西里文版的 35 年间,如果没有国家财力的大力支持,仅靠期刊本身的运营是难以维系的。

二、十五年对外发行传播,取得了哪些传播效果
斯瓦西里语主要在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布隆迪、刚果、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索马里等东非国家使用,约有五千万人(也有学者认为有一亿人左右)。在东非国家中,肯尼亚是斯瓦西里语的发祥地之一,有 66% 的肯尼

人把斯瓦西里语当作母语。斯瓦西里语早期是桑给巴尔以及东非沿海地区的语言,后来逐步发展到东非内陆地区,成为使用最广的一个语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东非国家大部分刚独立不久,面对部族众多,信仰、宗教各不相同的政治形势,亟需用统一的民族语言增强文化认同,而斯瓦西里语恰好承担了此项历史使命。在坦桑尼亚,1961 年坦葛尼喀独立时就把斯瓦西里语定为国语,1963 年又成为桑给巴尔的官方语言,1967 年双方合并后,斯瓦西里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坦桑尼亚规定在政府、政党工作以及会议用语必须使用斯瓦西里语,学校、军队里也推广使用斯瓦西里语,并培养斯瓦西里语教师,还设有一个斯瓦西里语研究院和斯瓦西里语委员会,负责斯瓦西里语的教育、发展和推广使用。此外,坦桑尼亚的《自由报》、《民族主义报》出版斯瓦西里语版。肯尼亚 1974 年把斯瓦西里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在中小学广泛教授斯瓦西里语,1985 年又开始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教授并推广使用斯瓦西里语办公。斯瓦西里语在东非民族整合、构建统一民族文化和心理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海娃的故事》等中国连环画的巨大影响。中国斯瓦西里语书刊的出版与发行,与东非这些国家大力发展斯瓦西里语言教育、用斯瓦西里语构建民族认同恰好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刚刚独立的一些国家不仅缺少斯瓦西里语教师,更缺少斯瓦西里文教材。中国专门出版斯瓦西里语书刊的出版社,虽然只有外文出版社一家,但出版速度快、质量好、品种多而且印刷精美。中国的斯瓦西里文出版物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东非一些刚刚获得独立、而且教育出版事业极不发达的国家用来进行斯瓦西里语教育、民族心理建构的文化载体。

尤其是一些儿童画册,如《我要读书》(王绪阳绘,印发 10 050 册)、《马头琴》(顾梅华绘,印发 10 050 册)、《杨司令的少先队》(范一辛绘,印发 10 050 册)、《小马过河》(陈永镇等,印发 11 030 册)等不仅调剂了书刊的品种、内容,还走进了成千上万的非洲儿童心灵世界。由中国聘请的斯瓦西里语专家翻译后的这些书籍,通过当时国际书店在桑给巴尔、坦葛尼喀的同业发行到东非各地时,受到热烈欢迎。

坦桑尼亚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在小学期间均使用斯瓦西里语教学,而升入中学、高中后又改为英语,英语是官方积极倡导的语言,这种做法在坦

桑尼亚独立后沿袭下来,因此斯瓦西里语的教材出版在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发展。^[5]有许多当地的少年儿童甚至是第一次看到斯瓦西里文的印刷体出版物。因此《小马过河》、《宝葫芦》、《珍珍的奇遇》、《蚌姑娘》等儿童读物,就成为当地少年儿童的启蒙、识字读物,甚至是小学教材。中国斯瓦西里文的儿童读物所建构的东方世界,不仅有别于前殖民地时期的英语读物,而且充满了神奇与智慧,在东非少年儿童的心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些儿童故事家喻户晓。中国儿童读物在当地孩子心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之深远,是当时所有在中国从事斯瓦西里文书刊的编辑、出版、发行的从业者都想象不到的。

当时中国对外书刊发行采取的是以政治宣传为主,文化贸易为辅的对外发行政策,基本上是有需求就尽量满足,采用来者不拒的发行方式。因此,大量斯瓦西里文书刊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东非,许多非洲儿童只需要花五个先令给中国寄封信,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份全年的《中国画报》。因此,非洲儿童来信就如雪片一样源源不断。据国际书店负责西亚非洲地区发行的老职工屠琳芳、景连如的资料,西亚、非洲的读者来信数量是全世界来信最多的地区,1972—1987 年的 16 年间,来信总量为 93.59 万封,平均每年 5 万多封,读者来信最多的是 1976 年,为 98 687 份,平均每天 270 封,1970 年的订户数量最高达到 11.6 万户。

其中来信最多的就是少年儿童。根据李书文的回忆,当时西亚非洲处最大量的工作就是处理堆积如山的非洲儿童来信。他在 1987 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十年前为一位退休同志举行的欢送会上,这位同志不胜感慨地说:“我在国际书店干了 20 多年,一直跟孩子们打交道(西亚、非洲一些国家中小学生来信订购期刊的信函)。办公桌上永远是看不完的一堆堆孩子的来信,一批孩子长大了就不见了,又来一批新的,永远是小学生的水平。”讲话的人不无遗憾之意,流露出对一生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听的人大多数似有同感,目光中透露出对自己处理那些成千上万封字迹歪斜难辨,文理不通的小学生信件的怀疑。^{[5] (P292-293)}当时,每天从非洲各地寄来的信件都要装满两个大麻袋,而信封里的信永远都是歪歪扭扭的儿童字体,有要寄画报的,有要寄儿童画册的,以至于当时国际书店的工作人员感到这些中国书刊的读者永远都长不大。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中国斯瓦西里文书刊对东非世界的影响。

儿童读物的影响是持久的,往往伴随着儿童从幼年到成人的整个历程。80年代后期李书文在坦桑尼亚书展上所亲历的一幕验证了中国书刊的传播效果。他在1987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1982年7月,我曾参加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国际贸易博览会,在我图书展台不时遇到一些大人领着孩子来指名买一些当时展台上没有的书,如《小马过河》、《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我感到有些奇怪,问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名的。他们得意的告诉我,他们小时候看过这些书,还读过好多其他中国书和中国画报。他们还提到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语录来证明对中国的了解,并说中国是坦桑尼亚最好的朋友。听到这些,我心里热乎乎的。当年我们的“小学生”读者今天又成为我们的成人读者了。

在和坦桑尼亚最大的政府报纸《每日新闻》的发行经理卡西卡纳的攀谈中,了解到他原来是我们六十年代的“小学生”读者,他在小学校学习时订阅中国书刊。由此认识了我任坦桑尼亚代理书店经理哈桑先生。中学毕业后到友谊书店当了店员,后来又《旗帜报》(《每日新闻》的前身)搞发行工作。他对中国书刊有着特殊的感情。现在他是我在坦桑尼亚最大的同业,每期发行我各种刊物17540份,商业信誉很好。^[4]

由这段记述可知,在60年代纷纷给中国写信,要杂志、要儿童读物的小读者,今天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任何地方,只要见到中国人,一种从幼年时期建立的亲切感就油然而生,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与亲切感,正是通过中国出版的斯瓦西里文儿童读物所建立起来的。这也是跨国文化传播效果的最高境界。

(二)“乌贾马运动”。文化传播的直接动力往往是从最现实的需要出发的。其过程大致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建立联系,关注彼此、感兴趣,然后接受、有行为变化。如果说中国斯瓦西里文儿童读物是从教育与心灵的塑造方面发挥了久远的影响的话,那么,大量的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读物在东非的传播则首先是因为东非一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

中国斯瓦西里文毛泽东著作以及政治理论读物,出版发行最繁盛的时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其中单本发行量最大的是1968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印发了580659册;其余的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青年运动的方向》、《反对自由主义》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共87种,平均印发数量均超过5万册。此外还有40多种政治理论文件。

毛泽东著作的斯瓦西里文版在东非的传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常被作为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来宣传报道,笔者收集了《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著作在东非国家的传播情况,通过这些略带有夸张性的报道,大体可体会到斯瓦西里文毛泽东著作的传播情况。

1964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为“桑给巴尔人民争购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副题为“奔巴岛一青年说桑人民可以从毛主席著作中学到经验与教训,用来解决和克服桑在建设新国家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报道中提到:“在革命之后,这里的人民最需要斯瓦西里语的出版物。上月份早一些时候,第一批五百本有斯瓦西里语增刊的中国画报运到人民书店后,立即在四天之内销售一空,需要更大的数量。这位经理还向中国国际书店把订货增加到每期一千五百本。”^[5]人民书店属于桑给巴尔执政党所办的书店,是中国国际书店在东非发行中国出版物的同业之一,在当地影响较大。因此中国出版的《人民日报》对远在东非桑给巴尔岛的人民书店的活动给予特别报道,并提到了斯瓦西里文版《中国画报》在四天之内销售500本,还要在以后增订到1500本。

另一份当时中国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参考消息》也经常有选择地转载外国报纸的报道,其中有毛泽东著作传播情况的报道,从一些当时作为反面文章的摘录中可以发现一些传播效果的记载。

1965年2月19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为“法《快报》对非洲革命形势表示不安惊呼中国革命思想在向非洲‘渗透’”的文章,全文如下:

【本刊讯】法国《快报》二月八日以《颠覆:在非洲的中国人》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在一九六四年初,周恩来在非洲的一次旅行之后说:“非洲大陆是革命的大好形势。”

一年后不久,人们可以算一下:刚果、安

哥拉、莫三鼻给和葡属几内亚燃烧起来了。在尼日尔和喀麦隆有游击队。刚果(布)、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后两个国家合并成了一个国家:坦桑尼亚)已建立了革命的领导,马里已使它的社会主义强化,苏丹发生了革命,使共产党人执了政。……

微笑的黄种人,口袋里装着毛泽东著作,旅行袋里装着冲锋枪,信手可以提出办法:这些中国人正在非洲的神话中代替那个口衔屠刀的人。……

真正的威胁,并不是一些中国人到了那里,他们(非洲人——笔者注)只愿意接待各国政府的谦虚的、审慎的、有能力的技术顾问的作用,而是中国的思想和技术向非洲革命者的渗透。……

非洲革命者从北京学到的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胜利实行过的武装斗争更适应于非洲的现实。他们也学到了——在这方面中国人表现出不那么教条——不应该奴仆式地模仿这种作法,而是必须使之适合于原始森林、荆棘丛林、部族社会和精神世界。

……在非洲渗透吗?无疑是。但是,这并不是口衔屠刀的黄种人在渗透。这是中国革命对贫困这种奴役方式带来的答案在渗透。^[5]

这篇法国《快报》1966年2月8日的文章,其出发点是提醒西方世界警惕中国在非洲的日益增大的影响,但中国《参考消息》的转载,则是告诉当时的国人,毛泽东思想的力量使前殖民者法国人感到恐惧。该篇报道虽然没有提到具体书名,但从另一面可以作为毛泽东著作在刚果(布)、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等地区传播效果的证据。

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的经验确实被非洲许多国家学习借鉴。“向中国学习”成为当时第三世界的一股社会思潮。以津巴布韦为例,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人穆加贝在民族独立过程中,采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在津巴布韦与坦桑尼亚的密林中经过7年的斗争,终于在1972年控制了罗得西亚2/3的农村,并用“人民大众像水,军队像鱼”等思想处理游击队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直至1982年获得独立。毛泽东的名字被一些游击队指战员拿来命名,津巴布韦民族联盟队伍中常常有几个毛泽东、几个周恩来。穆加贝对毛泽东充满敬意,他曾被白人殖民当局关押了10年,在狱中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著作,因为牢房总是转移,他

扔下不少物品,但随身却总是带着毛泽东的著作一再阅读。

1964年1月,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爱德华多·蒙德拉纳访问北京,当年中国派出一些军事专家在坦桑尼亚的阵营里,为莫桑比克培训了数万名游击队员。除了培训枪械武器的使用常识、中国的地雷战以及制造地雷的技术之外,毛泽东著作中的关于开展游击战争、赢得农民支持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军人对莫桑比克游击队传播最多的战略思想。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用毛泽东的名字命名一条东西走向的林荫大道,他们以此来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莫桑比克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支持和贡献。^[6](P164-168)

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那些把中国思想与非洲传统相结合的部分,这就是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领导人尼雷尔总统推广的“乌贾马运动”。乌贾马的原意是指非洲社会中集体劳动、共同生活的家族关系,尼雷尔总统在此基础上将之进一步发挥成为:没有剥削现象,基本的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有;人人必须参加劳动,接受领导分配;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成员之间发扬民主互助精神。每个乌贾马村由村民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但书记、主席由坦桑尼亚联盟任命。国家资助乌贾马村建设学校、医疗站、俱乐部、商店等福利设施。尼雷尔总统希望创造的是“只要他乐意工作,就不必为每天发愁,也不必去积累财富……这是过去的非洲社会主义,也是今天的非洲社会主义”。60年后的今天,冷静地评估尼雷尔总统的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颇为相似。

有一个细节足以解释当时普通坦桑尼亚人对中国思想价值观的接受程度。

1966年8月,一封来自坦桑尼亚的检举信,辗转到了毛泽东手里。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说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随信还附了一张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夫人身穿高档旗袍,带着一串珍珠项链的照片。毛泽东当夜就看了这两封批评信,还作了重要批示:“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毛泽东批示之后,还在他的名下画了一个大红圈,并签上了日

期:1966年9月9日。第二天,陈毅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来外交部召集部党委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并决定将这一批示立即转发到各驻外使领馆,要求他们按照勤俭办外交的方针,在对外活动和礼宾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4]

在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坦桑尼亚自1967年开始实行以建设集体农庄为中心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坦桑尼亚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直到1984年,全坦桑尼亚仍有9230个乌贾马村。乌贾马运动由于脱离国情,造成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从1986年起,坦桑尼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调改方案,连续三次实行“三年经济恢复计划”。直到近几年,坦政府将脱贫作为政府工作重点,推进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使国民经济得到缓慢回升。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然而此时却是中国斯瓦西里文出版物的绝对低潮期。到了1980年,仅有《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定价0.75元,100页)、《宝葫芦的秘密》(张天翼著,吴文渊插图,定价1.5元)、《八百鞭子》(24开连环画,任朴编文,赵洪武绘,定价1.2元)、《哪吒闹海》(电影连环画,定价2.2元)这四种斯瓦西里文出版物出版发行。

从东非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改革开放后30年间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经验,似乎比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要更有价值,而真正代表中国经济改革、及时反映中国发展与改革经验的出版物,反而没有传播到东非等国家和地区。曾经作为文化传播者主体的中国,没有再尽传播的义务,曾经的接受者也没有再续前缘,这倒是值得另外研究的题目。

三、对21世纪中国对外出版有哪些启示?

从《海娃的故事》到“乌贾马运动”,毫无疑问,中国15年间出版发行斯瓦西里文书刊所产生的传播效果是巨大的。20世纪中国留在非洲大地上的“中国映像”,是接受者——东非国家,与传播者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所共同构建的。值得21世纪中国借鉴的有如下两点:

(一)21世纪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从哪里开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5年间,中国斯瓦西里文出版物传播效果比之中国同一时期在欧洲、北美、南美地区取得的效果都大。从传播效果

发生的轨迹看,东非国家当时普遍需要争取民族独立,这个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才使大量的毛泽东著作、中国政治理论读物发行到东非地区,而并非传播者——中国自己单方面的主观行为。显而易见的是,以今天苏丹解体、利比亚的政治剧变为代表,因为20世纪的民族独立革命运动没有彻底完成而带来的后患:经济不能独立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从而导致各种矛盾加剧,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为相同的历史一幕又重新上演。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对非洲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学习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自觉行为。因此,21世纪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离不开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解读和分析,而且像当年翻译毛泽东著作一样译成多种语言,利用图书、报纸、期刊、网络以及数字载体等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广为传播,恐怕是一种必然选择。

(二)中国对外出版的内容设计,为什么不应该忽略儿童读物?中国斯瓦西里文儿童出版物在东非的影响,展现了毛泽东著作以及政治理论读物之外的另一种文化传播图景:从识字开始的教育传播,真正沁入心灵,因此产生的影响力也最为持久。由此提醒当下的出版界,中国儿童出版物的海外传播,其效果恐怕要远远高于一定历史阶段的思想、价值观的传播,因此决不能忽略儿童读物的设计。但遗憾的是,中国自2005年开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其中“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经典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等政府支持的重大项目中,都没有特别提出儿童读物的海外传播部分,这一点应提请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以及业界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 [1] 陈元猛. 斯瓦西里语在中国的传播 [J]. 现代传播, 1999, (2).
- [2]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1999.
- [3] 武庭杰. 试论外文书刊对外发行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J]. 出版与发行, 1986, (12).
- [4] 来炳. 坦桑尼亚斯瓦西里语初探 [J]. 黑龙江史志, 2009, (13).
- [5] 何明星. 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 [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
- [6] 桑给巴尔人民争购毛主席著作 [N]. 人民日报, 1964-03-24.
- [7] 本刊讯. 法《快报》对非洲革命形势表示不安惊呼中国革命思想在向非洲“渗透” [N]. 参考消息, 1965-02-19.
- [8] 胡锦涛. 非洲的中国形象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9] 老外的检举信 [J]. 党政论坛(干部文摘), 2008, (7).

责任编辑: 陈东霞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Investment Banks

SUN Guo-mao^{1,2}

(1. School of Econom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2. The Company Finance Research Center, Jinan 250022, China)

Until the year of 2011, there are 18 domestic listed security companies in the stock market, of which a few have already been close to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anks in the aspect of asset scale. Margin and stock index futures, plus the emergence of new business not only perfected the securities market operating mechanism, but also changed the security companies' income structure. Meanwhil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trend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olding features began to appear in the domestic financial industries.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playing significant roles in investment banking business model and competitive mode. In fact,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excellent domestic security companie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huge changes in business model and competitive way. So the evaluation systems must be changed and adjusted accordingly. New competition evaluation systems not only reflect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but also reflect the innovation abilities and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bilities. It will produce huge distinctions if according to the new evaluation systems.

From the Story of Haiwa to the Wujama Movement: the Overseas Spread of Swahili Books(Chinese Version)

HE Ming-xing

(China's Overseas Sinology Cente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During the years of 1964-1979, China published 230 kinds of Swahili journals and books including *China pictorial* and Mao Zedong works, as well as literature, art books and children's books. *The China pictorial* had issued cumulative numbers of 1 million copies in East Africa. Books in the east African had been issued up to 3 981 004, of which 676 482 are children's books. These books on Swahili produced an enormous impact in East Africa. Some books such as *The Story of Haiwa* and *Pony Crossed the River* are becoming so popular that some are even chosen as the textbooks. It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children's books.

Editor in Chief—Novelist and Didacticism in the Fic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AN Huai-qing

(Chinese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editors in Chief whose other identities were novelists. Therefore,